

【隋唐五代卷】

丛书主编 张燕瑾 赵敏俐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论文选

Selected Studies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20th Centu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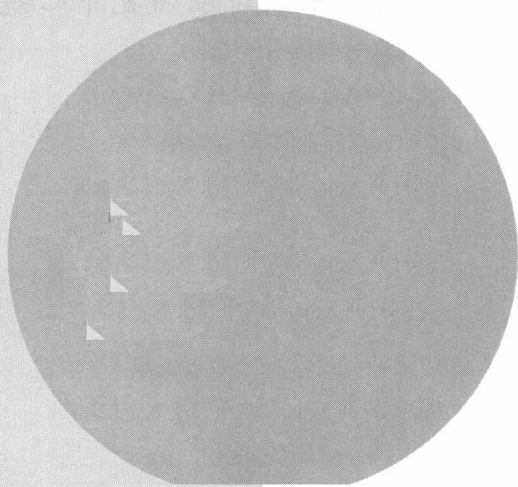
吴相洲 选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论文选

隋唐五代卷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论文选. 隋唐五代卷/张燕瑾, 赵敏俐丛书主编; 吴相洲选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5097-1166-8

I. ①2… II. ①张… ②赵… ③吴… III. ①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隋唐时代-文集
②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五代十国时期-文集 IV. ①I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01345 号

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论文选·隋唐五代卷

丛书主编 / 张燕瑾 赵敏俐

选 编 / 吴相洲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bianjibu@ssap.cn

项目经理 / 宋月华

责任编辑 / 薛 义 张晓莉 黄 丹

责任校对 / 赵灵杰 郑玉燕

责任印制 / 郭 妍 岳 阳 吴 波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59367028

排 版 / 北京春晓伟业

印 刷 /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 / 16

印 张 / 28.75

字 数 / 510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1166-8

定 价 / 1680.00 元 (共十卷)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

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由传统走向现代。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一大批优秀学人做出了无愧于时代的努力，取得了众多的优秀成果。温故而知新，从中选出一批标志性的成果，对于我们回顾前人走过的学术历程，更好地开拓新的工作局面，无疑是很有帮助的。

那么前人开拓性的工作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我想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提出和解决了文学史研究中的重大问题；第二，开启了文学研究新领域；第三，指出了文学研究的新方向；第四，具有很强的学术性，对后人治学有示范意义。此外，对由于受不同时期政治运动、文化思潮的影响而写出的时代烙印较强的文章，也个别收录，以作为后人回顾 20 世纪唐代文学研究史的一个标本。本着上述原则，本卷收录了论述隋唐五代文学的论文 39 篇，大体按时间来划分，如隋、初盛中晚唐及五代，同时也兼顾了研究对象的不同，如诗文之外的词、小说、变文等，以示照顾到了唐代文学研究的各个方面。一般说来，一个学者选文不超过两篇，每篇字数不超过两万。

下面就对各段收录的情况做一个具体的说明。

隋代文学只选了汪之明关于隋代文学史的信及余冠英的答信（《文学评论》1963 年第 1 期）。信讨论的是隋代文学划段的归属问题，汪之明认为应该归入后段，而余冠英则认为应该归入前段。其实如何划段，反映了对隋代文学的不同评价：即隋代文学是更像六朝文学，只作为六朝文学的延续，还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唐代文学产生了怎样的作用？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个问题。

唐诗是唐代文学的代表样式，论者众多，成果颇丰。其中有纵论整个唐诗之作，如刘师培的《读〈全唐诗〉发微》（《国粹学报》1908 年第 4 卷第 9 期），指出《全唐诗》在编纂上的一些疏漏，为日后人们重新整理《全唐诗》指出了方向。再如陈黼玄的《唐人五七绝诗之研究》（《国学丛刊》1924 年第 2 卷第 3 期），开始了对某一体裁的专门研究。虽然分体研究在 20 世纪之前乃诗评家通常之做法，但以论文的形式进行分体研究，此文还是有开创意义的。

傅庚生的《说唐诗的醇美》（1962年2月25日《光明日报》）则本着严羽的“兴趣说”，专门论唐诗的韵味，对后人探讨唐诗的艺术奥秘有开启作用。陈植锽的《唐诗与意象》（《文学评论丛刊》第十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较为晚出，但是运用了西方的文学理论研究唐诗的意象，这在20世纪80年代初是很有新意的。此后出现了许多谈唐诗的意境、意象的文章、著作，虽然不能说都是受到此文的影响，但起码说明这类研究在当时是代表了一定的学术潮流的。

在初唐文学研究当中，闻一多的《宫体诗的自赎》（《当代评论》第10期）堪称是一篇杰作。他以诗人的敏感和才气，对梁陈以来宫体诗发展的轨迹进行了清晰的描述，并对许多作家作品做了精妙的判断，既是一篇论文，也是一篇美文。闻一多的《四杰》（《世界学生》第2卷第7期）一文，较早地对初唐四杰的性格和创作进行了评判，对在新的文学研究中确立四杰的历史地位，有着重要的作用。而程千帆的《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文学评论》1982年第4期）全面考察了《春江花月夜》自创作以来人们对这首诗的接受过程，指出包括闻一多在内的许多人对这首诗的误解和理解。程千帆先生在这里虽然没有使用西方的关于接受美学的理论，但他详细考察历代人们对这首名作的理解与误解，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为后人研究经典的接受史有导夫先路的作用。刘大杰的《论陈子昂的文学精神——纪念陈子昂诞生一千三百周年》（1961年3月8日《文汇报》）则比较全面地论述了陈子昂这位盛唐时代的开启者的地位和作用，使陈子昂的盛唐文学的先驱地位变得更加巩固。赵谦的《初唐七律音韵风格的再考察》（《文学遗产》1990年第3期）全面地论述了七律的发展历程，尤其是从音乐角度探索了七律在初唐形成的原因，给人以很新的印象。

盛唐诗是唐诗发展的高峰，学人们也投入了更多的关注目光，因而留下了许多标志性成果。马茂元的《从盛唐诗歌看民间文学与文人创作的关系》（1959年8月4日《文汇报》）探讨了盛唐诗人创作与乐府民歌的关系，认为盛唐诗人的创作广泛地受到了民间文学的影响，同时创造性地提高了民歌的内容和体制，立论辩证而切实。陈贻焮的《盛唐七绝刍议》（《论诗杂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一文是陈先生的老境之作，考察了盛唐七绝的由来以及所以成为最能代表盛唐之音的形式的原因。陈先生善于作诗，他以诗人的敏感描述盛唐七绝的特征，间以后代诗话相印证，娓娓叙来，自成美文。20世纪的上半叶，王维的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特别是解放以后，由于受到现实主义价

值评判体系的局限,很少有人研究王维。陈贻焮的《王维的政治生活和他的思想》(1955年7月31日《光明日报》)对王维的生活和创作进行了研究,开王维研究之先河,至80年代,王维研究遂成热点。

李杜自然是人们研究最多的诗人。崔宪家的《浪漫主义的诗人李白》(《国学丛刊》1932年第1卷第3期)第一个将浪漫主义一词与李白联系起来。尽管今天看来,这一联系有很多问题,但浪漫主义却是20世纪人们概括李白使用最频繁的概念,影响极其广泛。陈寅恪的《李太白氏族之疑问》(《清华学报》1935年第10卷第1期)首次提出李白的氏族问题,文章虽然不长,但开启了人们对李白族属争论的公案。如詹锳的《李白家世考异》(《国文月刊》1943年第24期)就在此基础上对李白的家世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证。稗山的《李白两入长安辨》(《中华文史论丛》1962年第2辑)针对前人李白一入长安的成说提出异议,也开启后人关于李白几入长安争论的先声。李长之的《李白的文艺造诣与谢朓》(《北平晨报·文艺副刊》1937年第16期,)则是最早全面论述李白与谢朓关系的文章,后人在此基础上开掘,并出现了专门论述李白与谢朓关系的专著。詹锳的《李白〈蜀道难〉本事说》(《学思》1942年第2卷第8期)较早地关注李白《蜀道难》本事问题,数十年后,这一问题也成了人们聚讼不已的公案。胡小石的《李杜诗之比较》(《国学丛刊》1924年第2卷第3期)在唐宋人基础上重开李杜比较这一话题,此后许多学人都在这一问题上发表自己的见解,成了李杜研究的一个热点。

梁启超的《情圣杜甫》(《杜甫研究论文集》第一辑,中华书局,1962)是一篇奇文,集中阐述了杜甫的圣人情怀,反映了梁启超作为大家的高见卓识。郭绍虞的《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文学年报》1932年第1期)在20世纪30年代就对杜甫的《戏为六绝句》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使人们对这六首诗的解释也大体趋于一致。郭沫若的《诗歌史中的双子座》(1962年6月9日《光明日报》)将李杜并举,与作者后来所作《李白与杜甫》中的观点很不一致。程千帆的《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杜甫〈饮中八仙歌〉札记》(《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5期)是老境之作,一反前人对这首诗的解读,通过大量事实证明,这八个人都是因为不得志才饮酒自我麻醉的。文章写作功力深厚,足当示范之用。

白居易是唐代文学大家,20世纪对白居易的研究较早也最为深入的无疑是陈寅恪。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中的一系列文章不仅是研究元白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成果,而且所倡导的“诗史互证”的研究方法,得到了充分的体

现。《〈长恨歌〉笺证》就是其中的代表作。罗根泽的《韩愈及其门弟子文学论》（《文艺月刊》1936年第9卷第4期），则是较早地全面阐述韩愈文学理论的文章，特别是将韩门弟子放在一起考察，很有开启性的意义。朱自清的《论“以文为诗”》（1947年6月5日《大华日报》）从宋人说韩愈“以文为诗”谈起，纵论历代诗文评论中的种种见解，开启了后世学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萧涤非的《唐代法家诗人刘禹锡》（《文史哲》1975年第1期）是在特殊的年代所作，可作为了解那个时代的文学研究的一个标本。王达津的《温庭筠生平的若干问题》（《南开学报》1982年第2期）则是王达津的老境之作，辨析温庭筠生平的若干问题，清晰有力。

词的起源是词学研究中首先遇到的问题，人们在谈词的时候，几乎都要涉及这一问题。胡适的《词的起原》（《清华学报》1924年第1卷第2期）就是较早的一篇。文章对唐代诗人如何从作七言律诗到长短句的过程做了揭示，并认为这是为了适应乐曲演唱的需要。这一结论在今天看来，仍然是能够成立的。龙沐勋的《词体之演进》（《词学季刊》1933年创刊号）从相关概念和音乐的变化入手，详细考察了唐人“依声而制词”的过程，是一篇系统阐发词的发生及发展变化过程的文章。夏承焘、瞿禅的《令词出于酒令考》（《词学季刊》1936年第3卷第2期）在词的起源研究方面更深入一步，对令词与唐人饮宴时所施行的酒令之间的渊源关系做了探讨，使人们对词的起源的认识更深入而具体。后来有的学者顺着这一思路继续开掘，写成专著，足见其对后人的启示作用。唐圭璋的《李后主评传》（《读书顾问》1934年创刊号），则是较早对李后主这一晚唐五代重要词人生平和创作进行全面论述的文章。

汪辟疆的《唐人小说在文学上之地位》（《读书杂志》1931年第1卷第3期）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基础上，详细阐发了“唐人始有意为小说”的观点，进而论述了唐代小说与诗歌、曲、骈散文、后代笔记小说之关系，为后人研究唐代小说开启了众多法门。冯沅君的《唐传奇作者身分的估计》（《文讯月刊》1948年第9卷第4期）则详细考察了唐代科举与传奇创作之间的关系，认为是科举制度造就了新的阶层，这一阶层带来了传奇创作的繁荣。

敦煌藏经洞的发现，给20世纪的唐代文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王国维的《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东方杂志》1920年第17卷第18期）虽然写得很简单，却是最早介绍敦煌发现的唐代通俗诗和小说的文章，在引领后来许多学人研究敦煌文学上有着巨大的作用。郑振铎的《敦煌的俗文学》（《小说月报》1929年第20卷第3期）则在王国维的基础上，详细介绍和

论证敦煌的俗文学，尤其是对“变文”这一形式做了更详细的论述。向达的《唐代俗讲考》（《国文季刊》第3卷第4期）对与“变文”有关的俗讲情况做了详细的考述，如“唐代寺院中之俗讲”、“俗讲之仪式”、“俗讲文学起源试探”、“俗讲文学之演变”等，较为全面地描述出俗讲及变文产生的情况。

唐代诗歌的产生与音乐有着密切的关系，唐代诗歌的许多特点的形成，都可以从音乐角度找到真正的原因，因此从音乐角度来研究唐代诗歌，无疑会解决很多问题。20世纪，在唐代音乐文学研究方面，任半塘先生无疑是走在最前面的。其《唐代“音乐文艺”研究发凡》（《教坊记笺订》，中华书局，1962）一文便是其整个唐代音乐文学研究的总纲。后来实践证明，他所列的研究计划，大部分已经完成，对唐代文学的研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正是上述诸多前辈学者的辛勤垦殖与耕耘，20世纪的唐代文学研究园圃才得以绚丽多姿，果实累累。然囿于本套丛书选录体例的制约，还有许多在唐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优秀论文只能忍痛割爱；同时，受编者学识眼光所限，本卷所选论文也未必都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凡此种种不足之处，惟望方家大德，多予批评指导。

吴相洲

目 录



前言 / 1

隋代文学是北朝文学的尾声还是唐代文学的先驱? (汪之明 余冠英) / 1

读《全唐诗》发微 (刘师培) / 4

唐人五七绝诗之研究 (陈黼玄) / 7

说唐诗的醇美 (傅庚生) / 18

唐诗与意象 (陈植锽) / 27

宫体诗的自赎 (闻一多) / 53

四杰 (闻一多) / 61

论陈子昂的文学精神

——纪念陈子昂诞生一千三百周年 (刘大杰) / 66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 (程千帆) / 76

初唐七律音韵风格的再考察 (赵谦) / 89

从盛唐诗歌看民间文学与文人创作的关系 (马茂元) / 103

王维的政治生活和他的思想 (陈贻焮) / 110

盛唐七绝刍议 (陈贻焮) / 117

浪漫主义的诗人李白 (崔宪家) / 141

李白的文艺造诣与谢朓 (李长之) / 146

李太白氏族之疑问 (陈寅恪) / 151

李白两入长安辨 (稗山) / 154

李白家世考异 (詹锳) / 162

李白《蜀道难》本事说 (詹锳) / 172

李杜诗之比较 (胡小石) / 181

- 情圣杜甫（梁启超） / 187
- 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郭绍虞） / 198
- 诗歌史中的双子星座（郭沫若） / 225
- 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杜甫《饮中八仙歌》札记（程千帆） / 228
- 《长恨歌》笺证（陈寅恪） / 241
- 韩愈及其门弟子文学论（罗根泽） / 274
- 论“以文为诗”（朱自清） / 287
- 唐代法家诗人刘禹锡（萧涤非） / 293
- 温庭筠生平的若干问题（王达津） / 309
- 词的起原（胡适） / 319
- 词体之演进（龙沐勋） / 328
- 令词出于酒令考（夏承焘 瞿禅） / 361
- 李后主评传（唐圭璋） / 363
- 唐人小说在文学上之地位（汪辟疆） / 370
- 唐传奇作者身分的估计（冯沅君） / 378
- 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王国维） / 387
- 敦煌的俗文学（郑振铎） / 392
- 唐代俗讲考（向达） / 423
- 唐代“音乐文艺”研究发凡（任半塘） / 442

隋代文学是北朝文学的尾声 还是唐代文学的先驱？*

汪之明 余冠英

编辑同志：

一九六二年第五期贵刊发表了廖仲安等同志写的《初读〈中国文学史〉》一文，其中对《中国文学史》（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编著）把隋代文学置于《北朝作家》一章之中的处理，表示了不同意见。他们认为，“编者对隋代文学这样的处理，不仅埋没了一代文学，而且也不符合这个统一帝国的历史面貌。隋代文学不是北朝的尾声，而是唐代的先驱”。我觉得这个意见是有道理的。

首先，隋代结束了将近三百年的分裂局面，统一了全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上都为唐代打下了基础。特别是隋代实行科举取士，使庶族地主阶层的力量得以壮大。唐承隋制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终于改变了封建贵族垄断文坛的状况，对唐代文学的繁荣和作家队伍的扩大，都有直接的作用。廖仲安等同志的文章中举出秦代作比较，也有一定说服力。秦、隋同是统一全国的王朝，为什么秦汉相连而隋唐分离呢？这容易给人以自乱其例的印象。其次，我们知道，在南北朝诗歌的发展中，还逐渐呈现出南北文风相互交流的倾向。北朝作家往往因擅长南朝诗文而见重于时，南朝作家在脂粉富贵气的笼罩下，也学习北朝朴素刚健的诗风，写了不少以边塞为主题的作品。庾信就是这种南北文风交流的代表。这个倾向在隋诗中也是比较明显的。杨素、薛道衡、卢思道、虞世基等都以从军、出塞为重要题材，但又并不完全是六朝的简单模拟，而有一定的真实体会和感情，对大漠风尘的描写也有一些新的意境，可以说是唐代边塞诗的先声。隋代还企图用政治力量来改革六朝以来的浮艳文风。李谔在著名的“正文体”的奏书中说：“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矜吟咏。逐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

* 选自《文学评论》1963年第1期。

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说，不复关心，何尝入耳？”他曾得到隋文帝的赞同和支持。尽管由于条件尚未成熟，收效不很显著；但它是继北周时代苏绰的复古运动失败后的又一个重要回合，在古文运动的发展中是值得注意的。最后，在诗歌形式上，像卢思道的《从军行》、薛道衡的《豫章行》为唐初七言歌行的发展导夫先路；薛道衡的《人日思归》、虞世基的《初渡江》等也颇有唐代五绝的情韵，至于隋炀帝的《江都宫乐歌》似乎预示着唐代律诗发展的广阔前途。

由上所述，我以为隋代文学确有一些属于唐代“先驱”的内容，属下似比属上更合理些。自然，这样做对唐代文学的叙述在技术上可能带来某些困难，但权衡主次，似应以反映历史真实面貌为重。个人的想法不一定正确，希望能得到编写组的同志们的指教。

此致

敬礼

汪之明

汪之明同志：

《文学评论》编辑部转来了您的信，对我们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中将隋代文学放在《北朝作家》一章来叙述，提出不同意见。我们非常欢迎这种讨论。

关于隋代究竟应该和北朝还是唐朝放在一起论述，我们在编写过程中曾经反复考虑过。这部《文学史》的初稿是把隋唐连在一起的，后来所以变动的的原因是：

一、我们认为：隋代文学基本上只是南北朝的尾声，而不是唐代的先驱。隋代重要的作家都是由北周入隋。他们的作风入隋以后并无重大变化。即以杨素、薛道衡等人说，他们的成就既没有超过前代，而在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方面也没有跳出南北朝文风的藩篱。若论到唐诗所继承的传统，则从《诗经》《楚辞》一直到汉魏六朝的影响都很明显，并不曾从隋代诗人得到特别的启发。至于唐代盛行的律体，应该溯源于永明时代。过去的评论家常说谢朓已经开了唐诗的先声。继之而起的何逊、阴铿、徐陵、庾信等人的诗，也逐步显示出对仗工整和注意音律的特点。因此不能认为仅仅隋诗才是唐诗的先驱。

二、从隋代诗歌的情况来说，似乎也看不出像来信中所说的那样有着“南北文风交流”的倾向。北朝作家在诗歌方面很少特色。他们大抵模拟南朝作家。例如《颜氏家训·文章篇》记魏收、邢劼的爱慕任昉、沈约就是明证。庾信、王褒本是南朝人。他们到北方以后诗风有些改变，主要是生活经历和环境

的影响，未必由于南北文风交流。至如来信中提到的杨素等人的出塞、从军诗作，事实上也没有超出庾信等人的境界。因此，以诗歌的情况而论，周隋两代合在一起论述似更合宜。

三、在散文方面说，北朝的独特传统比较显著。来信中所提到李谔《上隋高帝革文华书》，显然是代表了北朝统治阶级对文体的看法。这种看法和北周的苏绰确是一脉相承。正因为周隋两代在这方面的关系如此密切，所以放在一起论述也比分开方便。

四、如果从隋代的社会历史方面说，它确是结束了近三百年的分裂局面，而唐代的不少政治制度又都沿袭隋制。这些事实显然对后来的文学有重大影响。然而，正如上面所说，这些影响，在当时却尚未有显著的作用。我们认为文学史的分期不应该忽视文学本身的情况，而不必勉强使它与社会史、政治史一致。

五、来信中提到隋代和秦代的处理不同，这是由于秦代是我国第一个统一帝国，秦所实行“车同轨、书同文”的政策，对社会史和文化史影响很大，而秦代几乎没有什么文学创作，因此可以单从历史考虑，从秦划一段落。至于隋代，则多少有些作家和作品，还是应该根据它的特点，使它和魏、齐、周合在一起论述为宜。

六、我们所以从唐代开始划分一个段落，把唐代作为第二册的开端，确如来信所说，有着技术方面的考虑。这是因为唐代是我们文学史上一个繁荣昌盛的时代，而把隋代放在它前面，确实在叙述中会带来一些困难。这种技术上的困难，其实正是由前面所说的一些事实所决定的。

七、关于隋代文学的安排问题，近年来出版的一些文学史也不一致。有些文学史著作中不把隋代和唐代紧紧相联在一起，而把它和上一段紧密相联，可能和我们所考虑的相同。不过像“南北朝与隋代文学”的提法和把隋代另立一节，作为附论，放在南北朝的后面的作法，是否妥善还值得研究，因为隋代的文学基本上沿袭了魏齐周的余风，而且隋代有差不多一半的时间处于南北对立的情况。所以过去的史家如唐代李延寿的《北史》，就包括隋代。后来的学者很多沿用这一方法，把隋也包括于北朝之中。我们的文学史也就根据这一传统的做法。

我们这些看法，未敢自以为是，还希望得到更多的指教。

此复，并致

敬礼

余冠英

读《全唐诗》发微*

刘师培

《全唐诗》一书，收辑之富，为识者所共知，然卷帙既繁，考核未精，故误收之作甚多。如姚合（八函三）《使两浙赠罗隐》诗（首句“平时时风好涕流”）与罗袞之作同（十一函四）。案，合与隐不同时，王定保《唐摭言》载此诗又以为姚洎所作。袞为洎副使，或袞代洎所为，非合诗也。唐彦谦（十函五）《赠孟德茂》诗自注云：“浩然子。”案，彦谦距浩然百余年，未必及见浩然之子，则此非彦谦诗矣。韩偓（十函七）《大庆堂赠宴元珙而有诗呈吴越王》，与无名氏（十一函八）之作同。案，偓未游吴越，则此非偓作矣（下文又和、再和、重和同）。薛涛《十离诗》（十一函十），据《唐摭言》以为元微之幕客薛书记作，则此非涛诗矣。张乔以进士隐九华，而乔有《省中偶作》诗（十函一），以冯唐作况，则此非乔作矣。又如白居易《东城桂》第三首（七函五）与古乐府同（惟首句“遥知天上桂花孤”，“遥知”作“可怜”），不得列入白诗也。欧阳彬诗有“桑柘斜阳里，儿孙落叶中”句（十一函九），注言“彬有子，作《田父》诗”云云，则此系彬子所作，不得谓之彬诗也。又全书之中往往一诗两见，如韩续姬（十一函十）《赠别》诗与韩熙载之诗（十一函四）同；李适《安乐公主移新宅》诗（二函二）与宗楚客之诗（一函九）同；杜牧《闻开江相国宋下世》诗（八函七）与许浑之作（八函八）同。而书中并未注明“一作某诗”（此书于二诗互见者，如李峰《西河郡太原守张夫人挽歌》注云：“一作李岑诗。”朱彬《丹阳作》注云：“一作陈存诗。”此三诗则否），此则辑者之疏也。自此以外，如裴度《凉风亭睡觉》诸诗（五函九），均似丁谓所为，不必定为晋公之作。又钟模《代京妓越宾答徐铉》诗（十一函六），张乔《杨花落》诗（十函一），孙光宪《采莲》诗（十一函六），薛涛《寄茗》诗（十一函十），均与他人之作重出，虽未能定其孰为误收，然考核之疏

* 选自《国粹学报》1908年第4卷第9期。

即此可见，况唐宋名家之集，伪作实繁。如李翱《戏赠》诗，皇甫湜《出世篇》（均六函四），均似后人依托，惜辑者之不知明辨也。

《全唐诗》中多载作者自注之词，亦有以后人之注误为作者之注者。如李绅（八函一）《欲到西陵寄王行周》诗云：“西陵沙岸回流急。”注云：“钱王以陵非吉语，改名西兴。”案，吴越建国远在绅歿之后，此必后人所增注也。徐铉（十一函五）《送从兄赴临川幕》云：“金柅亭边绿树繁。”注引《方輿胜览》。此书远成于铉后，此亦后人所增注也。若夫辑者注释之词，亦多失考。如高宗（一函二）之诗有言太子纳妃、太平公主出降者，考太平公主出降在开耀元年，其时之太子乃中宗，注谓太子即弘，然弘纳裴妃系咸亨四年事，非与太平公主出降同时，则注文大非。又张昭（十一函六）有《汉宗庙乐舞辞》，传言昭为南汉人。案，诗言“高庙明灵再启图，金根玉辂幸神都”，又言“正抚薰琴娱赤子，忽登仙驾泣苍梧”，明系五代后汉高祖之乐章，非南汉之诗，则传文是误。然唐人诗序亦有讹文，如郑嵎（九函十）《津阳门》诗序，首句言开成中，又言旅邸主翁年且艾，自言世事明皇，为嵎道承平故实，诗言“翁曾豪盛客不见，我自为君陈昔时。时平亲卫号羽林，我才十五为孤儿”。注引开元以六军为亲卫事。又言“湟中土地昔湮没，昨夜收复无疮痍”，确系宣宗时事。此翁及事明皇，年必百余，而序言年且艾，此必序文之讹也。若夫诗题之字，讹者尤多，或系刊本之讹。如殷文圭（十一函一）《赵侍郎看红白牡丹因寄杨状头赞》诗，“看”字上必有脱文；又张说《节义太子杨妃挽歌》（二函四），节义者，节愍之讹也；雍陶《题宝应县》（八函六），宝应者，宝鸡之讹也（诗言“渭水梁山鸟卵看”，又言“闻说德宗曾到此”）；孙元晏（十一函七）《陆统》诗，陆统者，凌统之讹也（诗有“将军身歿有孤儿，虎子为名教读书”句）。若此之流，未易悉数。其尤甚者，如李群玉（九函三）《送秦炼师归岑公山》诗，有“北省谏书藏旧草，南宫郎署握新兰”句，必系赠谏官迁省郎之作，与炼师还山无涉。唐彦谦（十函五）《题虔僧》诗，有“也嗔眉黛托腮愁”句，与题不合。此均系诗题之有误者也。若贾岛（九函四）《寄柳舍人宗元》诗，注云：“一本无宗元二字。”案，子厚未尝官舍人，当从一本之文。即诗人小传中亦有误字。如顾云《分修宣懿德三朝实录》（十函一），德系僖字之讹，萧项萧田人（十一函三），萧系莆字之讹，此则刊本之伪，均当亟为厘正者也。

《全唐诗》中所载感时伤世之诗，均可与史书互证。如杨炯（一函十）《和刘长史答十九兄》诗，言刘延嗣官润州为徐敬业所执也（故诗有“石城俯

天阙”诸句，又有“危言数贼臣”句）。岑参（三函八）《骊姬墓下》诗，言武惠妃之事也（诗言“献公恣耽惑，视子如仇讎”，又言“欲吊二公子，潢汾无轻舟”，刺讥之言可见）。高适（三函十）《辟阳城》诗（诗言“何得英雄主，反令儿女欺”，又云“母仪既云失”），祖咏（二函九）《古意》诗（诗云“夫差日淫放，举国求妃嫔”，又云“楚王竟何去，独自留巫山”），李嶷（二函十）《读〈前汉书·外戚传〉》（诗云“印绶妻封邑，轩车子拜郎”，又言“宠因宫掖里”），均讥杨妃之宠，兼刺玄宗之色荒。白居易（七函六）《思子台有感》（序言“祸胎不独在江充”，诗言“但以恩情生隙罅，何人不解作江充”，又言“但使武皇心似镜，江充不敢作江充”），郑还古（八函二）《望思台》（诗云“谗语能令骨肉离”），许浑《读戾太子传》（诗云“佞臣巫蛊已相疑，身歿湖边筑望思”），温庭筠（九函五）《四皓》诗（诗云“但得戚姬甘定分，不应直有采芝翁”），均刺文宗之废立，兼悼太子之沉冤。自此以外，则权德舆（五函八）《读〈谷梁〉之作》（诗云“奈何赵志父，独举晋阳兵”。又云“群臣自盟歆，君政如赘旒”），指李怀光之事言。吴融（十函七）《无题》之什（诗云“沁园芜没伫秋风”，又云“粉貌早闻残洛市，箫声犹自傍秦宫。今朝陌上相非者，曾此歌钟几醉同”），指韦保衡之事言。而戎昱（四函十）《苦哉行》，则又伤回纥之横暴（诗云“彼鼠侵我厨，纵狸授梁肉。鼠虽为君却，狸食自须足”，又云“羶腥逼绮罗”），感时抚事，情见乎词，推之李华《咏史》（三函外），王翰《飞燕篇》（同上），均指陈宫闱之失，敷陈往事，以寄讽谏之忧。罗隐《咏史》诗（十函四），韩偓《有感》诗、《观斗鸡》诗（十函七）均历指邪臣之非，比物兴怀，以写离忧之思，汇而观之，可以考见唐代之秘史矣。其足以考证人物者，其证尤多。如岑参《送许拾遗思归江南拜亲》诗（三函八），许拾遗者，即杜少陵诗中所谓许八拾遗也。李渥有《秋日登越王楼献于中丞》诗（九函三），李渥者，即《唐摭言》所记之李渥也。此亦《全唐诗》有补于考史之征。

唐人五七绝诗之研究*

陈黼玄

陈黼玄先生演讲 田世昌笔记

(一) 诗之界说

中国诗之界说，至为纷繁。今分诗式与诗心，二者论之：

1. 诗式 近体诗篇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律，句末复有韵。古诗似只有韵而无律，然据王渔洋《古诗平仄论》及赵秋谷《声调谱》，则仍有自然之音律。律也，韵也，皆所以使句调谐协，是为诗歌形式上之要素。

2. 诗心 《虞书》曰：“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卜商《诗关雎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梁元帝《金楼子·立言篇》：“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准此以谈，则感情为诗歌内容上之要素。

合而言之，则以谐协之文字，发表感情者谓之诗。夫发表感情之具有三：一为音节（音乐），二为色采（图画），三为文字（诗歌）。故刘彦和《文心雕龙·情采篇》曰：“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性发而为辞章。”然陆机《文赋》曰：“诗言情而绮靡。”绮即色采，靡即音节。《金楼子·立言篇》“至如文者惟须绮谷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亦以声音情采为文之要素。则诗歌实为无色之图绘，无声之音乐，兼有时间及空间二者之美焉。

(二) 诗之起原

郑玄以为诗之道放于《虞书》诗言志，大庭，轩辕，逮于高辛，其时有亡，载籍蔑云（《诗谱序》）。降及《诗》《骚》，始著篇章。自是而后，诗分古

* 选自《国学丛刊》1924年第2卷第3期。